



太平军在河南

54.4

河南人民出版社

太平军在河南

王天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太平军在河南

王 天 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信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册

统一书号 11105·1 定价：0.18元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

目 录

一、太平军到来前的河南·····	(1)
二、北伐大军挺进河南·····	(8)
三、突破黄河天险·····	(16)
四、怀庆战役·····	(26)
围攻怀庆 ·····	(26)
痛歼敌军 ·····	(31)
军民情深 ·····	(36)
胜利转移 ·····	(40)
五、革命风暴席卷中州大地·····	(44)
六、西北远征军在河南的奋战·····	(50)
经豫入陕 ·····	(50)
铁门大捷 ·····	(54)
会师中原 ·····	(57)
长驱入鄂 ·····	(61)
再接再厉 ·····	(64)
七、继承革命传统，准备新的斗争·····	(70)
后记·····	(80)
附图：太平军在河南活动路线示意图·····	(82)

一、太平军到来前的河南

太平天国革命前，河南人民在清朝地主阶级政权的黑暗统治下，过着被剥削被压迫的痛苦生活。

还在清王朝的所谓“极盛时期”，一七八七年六月，河南巡抚（统揽全省军政大权的最高官职）毕沅在一份给皇帝的报告中，简略地提到省内的普遍情况，说前一时期各县收成不好，农民多变卖土地房产，借以维持生活。近年情况更为严重，每当青黄不接之际，农民把就要成熟收割的麦地，贱价卖掉。山西等省的富户闻风赶来，乘机发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农民因而失地失业，即使丰收年份，生活也没有凭靠，以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过越穷。

毕沅是地主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者，他的话当然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的阶级关系，但多少透露了河南各县的一般趋势。那时候，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结合在一起，乘农民生活困难之际，趁火打劫，借钱一千，实付八百，按月滚算利息，不到一年，利息就超过本钱。期限一到，地主狗腿就登门逼租勒债，不能拖欠片刻，农民家中的猪、鸡、棉、布以至粮食、农具，全被他们搜抢而去，迫使许多农民卖儿卖女、卖地卖屋来交租还债。大批大批的农民被剥夺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沦为地主的佃农。例如西华一个姓赵的地

主，在一八二〇年前的三十多年内，占有的土地就增加了二十多倍。有人综合太平天国革命前河南和陕西、山西、河北等十余省的土地占有情况，估计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都集中在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阶级手里^①。农民用自己的生产工具去耕种地主的土地，将收获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八十交付给地主，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② 清朝地主阶级政权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工具。这个封建王朝的法律明文规定：佃农拖欠地主的租谷，或“侮慢”地主者，就要受刑八十杖，租谷全数追交。又规定：长工如果打死地主或地主亲属，就要加重一等或二等治“罪”；如果骂地主或地主亲属，也要受杖八十，徒刑两年。地主家中的奴婢，如果向官府控告地主或地主亲属，即使所告属实，也要杖责一百，徒刑三年；若是“诬告”，那就要被绞死。长工如告发地主，所告属实，比奴婢减一等治“罪”；所告“不实”，也一律绞死。相反，法律又规定：地主打死长工，可以不用抵命，减一等或二等治罪（实际上，许多地主打死农民，反动官府根本不管）。地主阶级凭靠国家政权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在亿万农民的尸骨上建立剥削阶级的“天堂”。

①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卷第一期）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横排本，第五八七页。

清王朝对广大农民的榨取也是十分残酷的。河南人民一年要交纳“地丁”银（按地亩征收的土地、人口税）三百数十万两，“漕粮”（按地亩征收的粮米）二十多万石。当时，政治十分腐败，贪污横行，各州县官吏都无例外地变换花样，对农民进行无休止的盘剥。特别是鸦片战争（一八四〇年——一八四二年）后，随着英、美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逐步加深，农民的负担与日俱增。由于外国资本主义通过鸦片走私和其他商品的倾销，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白银，造成各省银价普遍上涨。以前铜钱（当时社会上通用的主要货币）一千抵白银一两，到一八三八年，就要将近两千文铜钱才能抵换一两白银。农民从前巢谷一石半左右，就可交纳一两白银的赋税，后来就需要巢谷两、三石以至四、五石才行，实际负担增加了数倍。“千里为官只为财”的州县官吏，普遍滥用职权，任意规定银、钱比价和漕粮折价，贪污中饱，人民不能说半个“不”字。比如一八二九年，大河南北粮价每石不到两千文，而官府所收漕粮折价，竟是每石七千至九千文，浮收三、四倍。地方上的“乡约”、“里正”（类似解放前的保、甲长之类）和衙门里的吏役，又上下其手，用各种办法把负担转嫁于农民。这样，仅是所谓“正税”一项，农民的实际负担就超过清朝法定数量的许多倍。另外，反动官府巧立名目，向农民强征的各种“无名之费”，更难计数，竟有超过上述“正税”的两、三倍以上的。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因此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清朝封建统治者还强迫农民服无偿劳役，即所谓“差

徭”。除了如修城、挖壕等各项工程外，从皇帝以至下面的各级大小官吏过境，反动军队过境，递解“犯人”、粮饷或各种物资过境，州县衙门里从官员以至吏役、家丁外出走动，农民不管在农忙或农闲，都得无偿地提供牲口、车辆和劳力。实际用车一辆，官府往往勒派十辆，有的甚至捏造任务，凭空勒派，以“代雇”车马为名，强迫农民出钱作抵。赋税一年还只规定夏、秋两季，而差徭则随时随意可以勒索。一八五三年二月，来自陕西的四百五十名反动军队经过长葛，地方官吏强迫农民出车二百九十二辆（平均三人给车二辆）、马八十九匹迎送。反动军官将这些车、马全部私行“卖放”，又另外向地方勒索“价银”一百四十余串（一串合铜钱一千文）才走。这些负担，当然全部落在农民身上。农民交纳不起“差费”或其他“无名之费”，衙门吏役就捏称出钱垫缴，事后逼索加倍的利息。

由于反动官府只顾残酷地盘剥农民，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根本不闻不问，以至黄河连年决口，自然灾害十分频繁，十分严重。一八四一年、一八四三年，黄河先后在祥符（开封）、中牟决口，成千成万的人无家可归，每日都成千成百地冻饿而死。各地连年水旱，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穷困不堪。封丘一地，一八四七年大旱，农民饿死很多，在邻堤坝和石头坝之间，遍地都是饥民的尸骨，以至五十里内人们都无法砍柴割草，以后把这些尸骨收集在一起，筑了六、七百个大坟墓才算基本埋完。^①正阳一个地主

^①见民国《续封丘县志》卷二十六。

阶级知识分子记述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地方情形说：

“富人良田万顷，钱币如山，穷人却没有尺寸土地，虽丰年也都挨饿，不得不出门要饭，而富人却宁愿让粮食在仓里霉烂，不肯‘施舍’一点点。一些人细粮大肉都不想吃，另一些人则连野草都吃不饱。”实际上，大河南北各州县都是这样。正如南方农民起义军的一个告示愤怒指出的：“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除了奋起反抗，推翻万恶的地主阶级统治外，没有别的出路。

长期以来，富有革命传统的河南人民就以“结捻”等形式，广泛地开展分散的反封建斗争，尤其是南阳、汝宁、光州、归德等府（今南阳、驻马店、信阳、商丘等地区），

“结捻”的群众更多。反动统治者采取各种残酷手段厉行镇压，特别规定河南、安徽等省人民结伙三人以上就要加等“治罪”，携带武器的就要杀头，仅“结捻”而没有武器者，也或斩或绞或充军。但是，不畏强暴的河南人民却用更加激烈的反抗来回答反动统治者。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结捻”的群众遍于各府县，少则数人、数十人为一伙，多的达到数百人。有的强迫地主富商交出钱、粮，有的结队去地主家中“白吃”，有的捕杀地主豪绅和衙门吏役，给反动统治带来很大的威胁。反动统治者为了去除这个“心腹之患”，更加紧镇压，以捕获所谓“捻匪”的多少来考核州县官吏之是否尽职。一八五二年，河南巡抚李德特别向皇帝保证，要使省内没有不破的案件，没有不获的“罪犯”。为此他向各州县官吏和驻防的反动军队三令五申，要他们“振刷

精神”，尽力搜捕，并规定严格的期限，务使完成搜捕的任务。这个凶残而又愚蠢的反动统治者以为这样一搞，起来反抗的群众就可“绝迹”，城乡的地主富人就可“安乐”。

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种压迫越是暗无天日，农民现在的觉醒就越有力量，他们的革命冲击力就越难阻挡。”^①同反动统治者的主观愿望相反，河南捻军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特别是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一八五三年建都天京（南京）以后，河南各县人民在太平天国胜利进军的鼓舞下，更大批地团聚在捻军的战斗旗帜之下，声势越来越大，活动地区越来越广，从早期的经济斗争逐渐转向政治斗争。“竹竿开花猫下蛋，咸丰只坐二年半”等鼓动性的歌谣在民间流传开来〔意思是说：从前无法想象的革命变革就要来了，在位已经两年半的咸丰帝奕訢（音“煮”zhǔ）就要完蛋了〕，反映出人民群众摧毁清朝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决心和信心。全省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革命形势日益成熟。

面对着这样的形势，胆战心惊的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军事上以至思想文化上，进一步强化反动统治，妄图阻挡农民革命的洪流。他们主张用反革命暴力来防止农民的革命暴力，用对革命群众的凶残来维护统治阶级的“人道”，杀气腾腾地叫嚷：处在当前的动乱时代，不能讲什么“忠厚”，必须心狠手辣，肆意屠杀，以便“杀一儆百”。怀庆（沁阳）的

①《马克思论美国的“平分土地”》，《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二九九页。

反动官府专门张贴告示，规定如有在夜间携带武器“抢劫”衣物者，地主就可任意把他打死。各地地主豪绅也纷纷蠢动起来，以抗拒农民革命的风暴。还在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前，一些地主豪绅就预感到“大乱”将起，让子孙学习兵法和武术，准备与起义农民拼一死战。有些州县的地主豪绅还组织起地主武装——团练，强迫农民出钱出力，为他们“保家”。光山一个地主武装头子，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擅自捕杀农民二百七十多名。卢氏、怀庆、柘城等地的反动统治者还炮制什么《敦俗劝士文》、《劝民文》、《劝孝歌》等反动诗文，组织地主阶级向四乡人民“宣讲”，力图用“孔孟之道”来消除人民的革命意志，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大决战，就要在中州大地全面展开了！

就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派遣的北伐大军来到了河南。

二、北伐大军挺进河南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等农民领袖的指挥下，这支由汉、壮、僮等族战士组成的农民革命大军，以破竹之势，出广西，入湖南，克武昌，然后沿江直进，于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一举攻克了江南重镇江宁（南京），改名为天京，作为农民革命政权的首都。革命战争取得了初步的、辉煌的胜利。

天京建都以后，为了解除长江上游的威胁，为革命政权开辟广大的革命基地，太平天国便派出西征大军，沿江西上，开拓长江流域；为了直捣清朝反动统治的老巢——北京，摧毁地主阶级中枢政权，太平天国又派出北伐大军，挺进华北，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当时的华北，特别是京津一带，聚集有一二十万反动武装，是反动统治力量比较雄厚的地区。北伐大军要横越数省，与守护老巢的敌军主力进行决定性的战斗，任务是十分光荣，也十分艰巨的。由于这时太平天国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巩固革命首都上，把力量主要用在抵御清朝的江南、江北大营和开拓长江流域上，只能派出九个“军”^①共两万多人

^①太平天国的作战部队以“军”为单位，一“军”按编制应有一万三千多人，但通常实际只有数千人。

的队伍，担当北伐的重任。洪秀全和杨秀清的计划是：乘清朝反动统治者正在手忙脚乱，还没有在军事上作好充分的准备之际，抓紧战机，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直取京津，夺取胜利。因而，规定北伐军的战略方针是：乘虚猛进，疾趋北京，不要贪图攻城占地而耽延时日。

统帅这支北伐军的是太平天国的名将林凤祥、李开芳等。林凤祥，广东揭阳人，早年因反抗当地反动官府的迫害，从广东度越关山来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参加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是太平军中最早的一批“老兄弟”之一。金田起义时，短小精壮、英勇刚强的林凤祥，就被选拔为“先锋”，此后一路打头阵，攻克武昌、江宁等名城时，他都率队先登，战功卓著。李开芳是广西浔州（桂平）人，与林凤祥一样，都是太平军中战功卓著的大将。他们被洪秀全、杨秀清选作统帅后，就毅然决然地担负起率军北伐的重任。遵照洪秀全、杨秀清规定的战略方针，他们率领北伐大军，避实击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穿越了安徽，直叩河南大门。

被人们看作“南北关键”的河南，是北京的屏障，又是当时清军重要的后勤基地，清王朝从这里不断地抽调兵员、提取粮、饷、火药、硫磺、铅丸、锅帐等军用物资。如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扬州围攻太平军的清军“江北大营”^①一次就从河南调取火药、铅丸各五万斤，火绳三千盘。

^①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清“钦差大臣”向荣率军跟随而至，在孝陵卫成立所谓“江南大营”；另一“钦差大臣”琦善从河南率北方和东北的马、步兵赶至扬州，成立所谓“江北大营”。

由于河南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不论革命和反革命方面对它都非常重视。还在一八五二年太平军从广西进至武昌时，就曾派遣多人化装入豫侦察清军部署。攻克南京之初，洪秀全、杨秀清等还打算乘胜进军中州大地，以河南为基地而后进图全国。清朝反动统治者估计到这种情况，因此对河南的防务就倍加注意。一八五二年，太平军才从广西进至长沙时，上任未久的河南巡抚陆应谷就感到本省人民对清朝统治十分仇恨，很可能会与太平军“勾结”，因而通令全省各县切实办理保甲制度，加强对人民的防范和镇压。该年年底太平军攻克武昌后，河南就开始戒严。次年年初，洛阳、开封等地的反动官府都不止一次地查获到太平军的侦察人员。五月间，北伐军又胜利地进入安徽。面临着锐不可挡的太平军，以陆应谷为首的反动统治者就加紧进行反革命部署：

1. 组织地主武装——团练和乡勇^①。河南原有反动军队近三万人，大部分都已调往南方，这时留在本省的只有老弱数千。反动统治者深知，在数万太平军的凌厉攻势面前，这几千“不练之师”是“万难抵御”的，因而就动员地主豪绅举办团练，反动官府则募集乡勇，以加强反革命力量。在省城开封，反动官府募集了流氓一两千名，分驻于五门之内，准备抵挡太平军。

2. 加强白色恐怖。布告各地，凡是外省口音、行动“可疑”的人，地主豪绅都可以不经官府就地捕杀；强化保甲制

^① “团练”是强迫农民自备粮械，平时务农，战时临阵，一般在本地活动。“乡勇”则由官府给饷给械，是一种随时随地可以调动的职业军队。

度，规定人民有起而反抗而邻里不检举者，都一律办“罪”。对于“结捻”的群众，更疯狂地进行镇压。光在永城一地，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屠杀了近千人。

3.加强黄河防务。特派大官僚带兵沿河巡查，在各渡口加强警戒，一旦情况变化，就将沿线所有船只全部收泊北岸，使太平军找不到运载工具而无法飞渡，妄想凭靠黄河天险而阻挡太平军北伐。

4.增调反动军队。先后调拨和截留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的反动军队七八千人，在永城、归德（商丘）、周家口（周口）一带布防，又命本省河北镇和南阳镇的总兵^①率部星夜赶来豫东增援。六月十六日，太平军攻克亳州，陆应谷感到“河南门户已失”，亲自拼凑了三千反动武装赶往归德的宋家集。为了增强军力，他一面把原来调往安徽的陕西、宁夏马步军队二千余截留下来，一面要求安徽的反动军队星夜来河南“会剿”，妄图把太平军抵拒在河南大门之外。

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命令北伐军统帅林凤祥、李开芳等：“尔等（你们）奉命出师，官居极品，统握兵权，务宜身先士卒，格外放胆灵变，赶紧行事，共享太平。”命令送到军中时，北伐军正向河南行进。林凤祥、李开芳等统率全军将士，坚决执行太平天国中央的指示，在六月十二日离开亳州，向河南直插过来。

^①清朝的正规军，分为满族的“八旗兵”和汉族的“绿营兵”两种。统辖全省绿营兵的最高武官叫“提督”，下分设镇、协、营、汛各级，统率一镇绿营兵的武官叫“总兵”，其下还有副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级。

北伐军挺进河南，离南方革命基地越来越远，与天京通一次文报都极其困难，要想从首都取得兵员、军火、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接济，几乎不可能。但是，太平军是一支以各族的贫苦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以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实现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理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目标，全军上下，有着共同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利益，充满了深厚的阶级情谊，战斗意志非常旺盛，不管是抢渡急流险滩，还是攀登陡壁悬崖，无不前仆后继，争先赴敌。战士们来自人民，热爱人民，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它不乱杀一人，如有占夺人民一草一木者，就要受到严厉的军纪制裁；不得不承认它有强大的战斗力，说它“攻必破，守必坚，前进就不可抵御”。在林凤祥、李开芳等坚强的统帅的指挥下，全军将士蔑视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斗志昂扬，高歌猛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都热烈欢迎，并踊跃参军。正在与清朝反动统治者战斗的河南捻军听到太平军逼近的喜讯，更加欢欣鼓舞，主动前往安徽请求并引导北伐军从速进兵。在河南捻军的引导下，林凤祥、李开芳等指挥全军，向豫东重镇归德急进。

陆应谷知道，太平军由皖入豫，永城、归德一线首当其冲，因而四处赶调反动军队于此重点设防。同朝气蓬勃的太平军正好相反，各支反动军队都十分腐败，将官克扣军饷，待士卒如奴隶。当兵的一部分是流氓，平时聚赌窝娼，无恶不作；另一部分是被统治阶级称为“花子”的破产农民，平